

风采之路

Fengcaizhilu

叶何
丁

辛谦
禾

等著
编

华 龄 出 版 社

风采之路

叶 辛 何 谦等著 丁 禾编

出版发行：华 龄 出 版 社

(北京西黄城根北街11号)

经 销：新 华 书 店

印 刷：石油物探局制图印刷厂

787×109 毫米 32开 9.6印张 200千字

199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6月

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5000册

ISBN7—80082—062—9/I·25

定价：4.60元

前 言

崭新的1990年即将到来之际，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，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，而且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。为了讴歌企业家们立下的勋业，记录他们的英姿风采，揭示他们获得成功的奥秘，介绍他们的管理经验，以便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继续探索创新，开拓前进，特编辑了《风采之路》这本报告文学集，奉献给广大企业家和广大读者。

本书各篇均采用写实手法，反映了最新的时代精神，描述了企业家们进取、求新、拼搏和竞争的意识。仔细读之，它能给人以深深的回味和思考！

为了引起不同层次的读者对本书的爱好和兴趣，特选编了一组题材新颖、内容健康、情节曲折、风格各异，读之令人感叹的中篇纪实文学作品，以飨读者。

本书在组稿和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了李超、吴德海、李德然、许树松、史光升、雷讯、杨开卷等同志和冯登泰教授以及其他许多热心同志的积极支持，在此特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编 者

1989年11月1日于北京

目 录

奋斗不息拼搏不止的女性·····	叶 辛 (1)
新兴的企业·····	石永言 (29)
万事人为本·····	段 扬 (46)
绿遍荒山志不移·····	郭万才 (66)
百折不挠的投标者·····	王 水 (81)
走出困境·····	庞本驹 (86)
凤凰展翅·····	金永福 朱宗越 (103)
腾飞的“山鹰”·····	吴国春 李 珺 (120)
酒 魂·····	奚晓阳 (136)
咖啡人生·····	何 谦 (151)
粉红色的梦·····	吴正德 吴久德 (207)
黑色星期一·····	何 澜 (279)

奋斗不息、拼搏不止的女性

——关于徐英莲

叶 辛

一、她为何这么神？

那是 1987 年的春天，两年前的事了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。

省委交下了任务，为拍摄《多彩的贵州》，写作一个脚本。我和几位同志接受了任务，在省城里碰过几次头，了解到一些线索，就往下头跑。

我们决定先去凯里，了解少数民族村寨的民俗风情和近年来的发展情况，临行之前，国防工办的副主任童兴源同志对我们说，那里有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的两个厂子，都是身居山沟做出了大成绩的，可以顺路去看看。工业的情况本在写作计划之列，我们便把去那两个工厂列进了行程。到了那个生产录音机芯的厂子，厂长季明野给我们介绍这介绍那，还领着我们四处参观，话语之间，不时地随口吐出一句“徐老太怎么说怎么讲……”初初听到“徐老太”这三个字，我觉得莫名其妙，不由得多瞅了季厂长几眼，心想这厂长上班时还记挂着家务事。多听几句才明白他是在谈一位上

级。当时我还有个错觉，以为这位徐老太是他的前任，直到送我们出厂门，才听他说，不能远送了，徐老太来了，我得去向她汇报。我终于忍不住问，这个徐老太是谁？他说，她是振华电子工业公司总经理呀！一边说一边露出诧异之色，仿佛在说，怎么，讲半天你不知她是谁啊？我又问了一句，徐老太原来是这家厂子的吗？季厂长忙说，不是不是，她原来是新云厂的。新云厂就是我们下午要去的厂子，我不再多问了。心里却纳闷，一个壮壮实实的中年汉子，为啥一提起徐老太，就显出如此尊重之意。同时，也不知怎么搞的，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徐老太的形象来，瘦瘦高高，一脸的严肃，并且我还认定，这位徐老太一定是抽烟的，我甚至能想象出她那抽烟的姿势和功架。

下午我们去了新云厂，厂长张亨文在陪同我们参观和介绍情况的整个过程中，也不时地提到徐老太。我心里说，这事儿奇了，一个女同志，老太婆，竟有这么神？我们见到的这两位厂长，都不是等闲之辈，几千人的厂子，吃喝拉撒睡，从婴儿出生到老人进坟墓，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样样都要管到，而且管出了水平管出了名声，在同行业中是名列前茅的。如果说我们的工厂“企业办社会”的现象较为普遍，那么地处山沟里的工厂“企业办社会”的问题就尤为突出。要在那种环境里当个称职的好厂长实在是不易的，没有人们时常说的“两刷子”，只怕还会将厂子搞砸了。而这两位精明强干的厂长，一提徐老太，都那么尊崇敬重，徐老太这三个字，便不能不在我心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往本子上记的时候，我象突然想起似地问，她叫什么名字，这个徐老太？人们告诉我：

徐英莲。

于是，我脑子里便存了一个念头，什么时候见见她。哪晓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徐老太，却不是那么好见的。

振华电子工业公司在都匀，那是我们行程的第二站，况且我还知道，这个公司就在我住的招待所旁边。在都匀的一个星期的时间里，却偏偏没见着她，问她去哪儿了，不是说从凯里回来了吗，回答是她直接绕到其他工厂去了。是啊，我想想也是，振华电子工业公司的二十多个企业，星罗棋布地散在苗族、侗家、布依族集居的山野里，她这个总经理往下头跑一圈一个厂子只呆一两天，也得一个多月呢！



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总经理、全国十大女优秀企业家徐英莲。

抱着点遗憾，离开了都匀。以后更没机会见着她了。

谁知，这一年多时间里，徐英莲的大名却轰隆隆地响起来。报纸上登，电台里播，据说还在电视里出现，我一直没有幸运见着。那高潮是在1988年的“三八妇女节”，徐英莲被评为“首届全国优秀女企业家”，照片登在贵州几乎家家都有的“广播电视报”上。一见报纸，我还有些得意，瞧，我说她是个瘦瘦的女人吧，她一定还长得高，坐下来就吸烟。照片上当然是不会挟着一支烟的。

省报上先登她赴京接受光荣称号，没几天又登她接受了

称号回来啦，我估计当晚的电视新闻里会有她的镜头。这估计倒没错，电视台记者是到磊庄机场接她去了，可那镜头晃啊晃，晃过了好几位领导，好不容易晃到她那儿了，却又模模糊糊的，看不甚清楚，更瞧不见她是高是矮，我“啪”的一声关了电视。不过我那时已不觉遗憾了，因为我已晓得她在前不久结束的省人代会上，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。而不几天，七届一次人代会就要召开。到了会议上，不愁见不着她。

代表团在贵阳集中的时候，没见徐英莲，向工作人员打听，说她忙，会议开幕时，她会赶到的。

开幕式前的一天，在北京惠侨饭店餐厅吃过晚饭，有两个女同志边说话边在我前头走，年纪稍长个头略高的那位我认识，是省保险公司的，另一位说话轻声脆气，个儿矮矮小小的，正在笑咪咪地谈着一件衣裳的剪裁。我心里说，这人是谁呢？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，轻声告诉我，这位就是徐英莲。

我愕然，大名鼎鼎的徐英莲，怎么竟是如此矮小，说话如此轻声柔气，还架着一副眼镜，她哪象个凛然令人起敬的总经理，她倒更象大学里的一位教师。这以后几天我一直在观察她，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主观猜测和想象全离了谱，她不抽烟，不但没有那种女强人的相貌个头，更没那类文学作品中女强人的气派和威风。她的脸上经常带着笑，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亲切地闪烁着，说话的声气腔调，始终是温柔的、清脆的，如果光是听她讲话的声音，一定会以为她还很年轻。

我心里纳闷了，就是这么一个女子，她靠什么建立起自

己的威信呢？她的身上究竟有些啥魔力呢？

二、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

在井冈山山区的边缘，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县城吉安。吉安有山有水，县城里有一条一条高高低低的石砌路。徐英莲的青少年时代，就是在这么座县城里度过的。

她的父亲是江西奉新县人，那时候在南昌的银号里当出纳。徐英莲六七岁的时候，轰隆一声枪响，日本人打来了。她妈妈带着孩子，逃到了吉安。那时她念到二年级，象中国很多家庭一样，当经济拮据的时候，家庭里只能保证儿子继续上学。徐英莲有个弟弟，她得给这位弟弟让路。日本人走了，在含辛茹苦的妈妈的操持下，她才又与赶上来的弟弟一起上学。可以想象，那段日子是很苦的，姐妹三人依傍着母亲生活，但是徐英莲在少年时期就知道争气，她的学习成绩好，连着跳班，把给日本人耽搁的时间追回来。

吉安国立十三中设山里，去那儿读书要走十五里路。徐英莲在这里读初中升高中。念到高二的时候，江西解放了。50年高中毕业，她考入南昌大学学工。院系调整时进入广东的中山大学。后来以工学院为基础，成立华南工学院。于是徐英莲他们这班学生，自然而然成了华南工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。

大学的名称变化得快，她的生活节奏更快，在大学里，要搞团工作，又要每门功课保持优秀，至少80分以上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可她硬是做到了，后来她提起这段经历，说了五个字：把我憋死了！也许正是那时候“憋”出来

的，也许正是那段时间为她打下了基础，锻炼了她的组织能力，锤炼了她的意志和毅力，使她在业务上成了一把强手。

她还记得毕业前在广东东莞一个厂里实习的情况。她在大学里有了对象，他在北京工作，她多盼望毕业后能分配到北京去。姑娘们也嘀咕着替她出主意，让她去要求，可她觉得不好意思。好不容易读到大学毕业，还没为国家作贡献，怎能就向国家提要求呢。她被分配在二机部十局新厂处。既是新厂处，就随时要被分到下面新建的工厂里去。当初正是蓬蓬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，欣欣向荣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，我们新建了多少工厂啊！果然，1956年，她来到了成都的715厂，在那里一呆就是十五年。

715厂座落在成都东郊，现在那里已是一派新兴的工业区，一片厂房和高楼。而当年，那里全是连片的农田。徐英莲还记得，54年头一次去的时候，是拿着指南针去的。如今她调到这儿来工作了，她搞什么呢？她搞了一个“去离子水”，用了两根管子。当时和她一起搞的老工人，现在成了“去离子”专家。搞成了去离子水，徐英莲为科学院写了一篇文章，登在杂志上。那是她记忆中第一次发表论文，同行们都很重视，觉得有新意，有创见。徐英莲在设计科新产品实验室当上了组长后来又当了主任，和人们一起安装设备，调试设备，眼看着715建成投产。从1957年到1964年，徐英莲一面埋头苦干，一面和全国人民一起，经历了反右、大跃进，反右倾，四清，运动一个接一个。别以为她纯粹搞技术，和这些运动无关。其实关系大着呢，反右的时候就要她们砍产品，而反左的时候，又要他们扶产品，动不动就要把一般技术问题当阶级斗争批，查三代，查海外关系，追根溯

源，挖思想根子。搞科研的能受得了这样的折腾吗？徐英莲心头有主见，喊砍产品的时候她没砍，喊扶产品的时候她的头脑也不发热发昏，照样干她的。总还得尊重科学、尊重客观规律嘛。她在实验室一干就是七年，七年里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。反右倾时，实验室出了个事故，上面要火线整风，整什么风，整风就是整人。她是实验室主任，首当其冲。恰恰在这时候她病了，病了也得参加整风，这可是态度问题。但是她身体支撑不住，拖了几天拖不下去，只得坐七八站车去医院。医生一检查劈头就问：“病这么重，为什么这样晚才来！”她说要参加火线整风。医生一听火就来了：“什么火线整风，体温这么高，都快把你烧死了，你还整风！”又有一次，实验室一位技术员偷偷改了她确定的方案搞实验，实验当中起火了，技术员吓坏了，不敢承认是他改了方案，徐英莲心中有数，她一字一顿地盯着技术员道：“你一丝不苟地按我的方案做，起火我负责任……”技术员终于尴尬而惭愧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

别以为小小的实验室风平浪静，在那个运动接运动的年头，要干点事业可真难。那么，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徐英莲玩命干呢。说起来还是同她的个性有关，同她小时候跳班读书一样，她心中想的只是：争气。

有一次，厂里来了个东德人，趾高气扬地逛了一圈对她说：“你们，你们十年也试制不出钽电解电容器。”

徐英莲就象遭受了奇耻大辱，她说：“就冲这，我们也得激发干劲，拼命。”

徐英莲的母亲出身于一家落第秀才，父母去逝得早，因为穷，更因为无人照顾，当了童养媳，认不到几个字，深感

自卑，所以认定了一条死理，家里再苦，再可怜，只要勉强糊口也得让女儿读上书。在母亲的熏陶下，徐英莲深深感到，一个妇女必须自强自立，奋发图强，自信努力，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走自己的路。如果说小时候她只是为走自己的路刻苦攻读连续跳级的话，那么今天她激发起来的已是一种民族的自尊，一种为国为民献身的精神境界。

外国人不是瞧不起我们吗？等着吧，我非要干给你看看。

决心易下，行动难啊！况且，况且徐英莲的条件如何呢，她，一个妇女，大学毕业以后工资46元，16元留下自己花，30元寄给家里赡养老人。那留下来的16元，说是花，那叫花吗，那只是一个月的伙食费，还能怎么花。1957年，她的父母随她到了成都，帮助她照料孩子。她生下孩子四十天就去上班。一上班便通知她出差去北京，她哪里顾得上家呢？爱人远在北京，后来好不容易和铁道部一个工程师对调才到了一块。成都局把她调到贵阳观水路第二勘测设计院，名义上说是出差，实质上是一年四季当长驻人员。继续让他们当牛郎织女。那些年里，徐英莲拖着两个孩子，上午七时出门，晚上九点归来，她把除睡眠之外的所有时间，几乎都交给了事业。若不是有父母亲帮她守着家，真难想象那日子怎么过。后来孩子渐大，入学读书，每天都是孩子放学归来，把作业做好，摊在桌子上，等她晚上回家来，趁着临睡之前那一阵，检查他们的作业，尽一份作为母亲的责任。

也许正是她这份精神，也许正是她没日没夜的苦干感动了“上帝”，1964年她当上了设计所主任。为什么拖至1964年才提呢，论她的能力和才学，她早就可胜任这一工作了。原

因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，徐英莲有个叔伯的姐妹在台湾，有海外关系，多少年来，组织上对她非常信任，厂长、书记也喜欢她那苦干精神，可因她的海外关系，总是把她作为控制使用的人员。

尽管如此，徐英莲觉得党和组织始终是关心她，爱护她的。那年孩子才一岁半，父亲患急性肾炎躺倒在床，母亲的病更可怕：肠癌。她一个弱女子，简直不知怎么办了。风尘



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壮观的录音机生产流水线之一角

仆仆外出归来左等右等怎么家里只有动静，却不见人来开门。打开门进屋，小的要照顾，老的要守护，她手足无措了。在她噙泪守着母亲的日子，党小组里的每个党员，替她轮流守，让她好有个翕眼的时候。母亲病重，她推着三轮车往医院里送，医院里就是不愿接。送不进，怎么办，急死人了，厂长知道了决定用厂里的轿车送。事情就是这么奇，轿车往医院里一送，医院就接了。徐英莲没记着医院里这种古怪的规矩，她只记得，她生小孩的时候，厂里也是用这小

轿车送的。因为她对厂里有贡献，而她呢，只知道厂里对她的关心照顾，只知道感激，今后更拼命干，用加倍的努力来报答……她有感恩思想。

三、在文化革命初期

抱着感恩思想，步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，她怎么会不当保守派呢

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学校烧到社会上，又从社会烧进工厂，烧到设计所里的时候，首当其冲的，是一些技术人员挨批，大字报满天飞，造反派的气焰可以把整个设计所一把火烧了。作为设计所的主任，徐英莲站出来，公开地保那些技术人员。这个人没问题，那个人有一技之长，凭什么要批他们？他们为国家搞科研没有罪。好啊，正要找活靶子呢，你倒自己跳出来了，胆敢偏袒臭老九！造反派立即揪住了徐英莲，批她的专家路线，批她不支持造反派。当时四川的文化大革命闹腾得越来越凶，武斗在升级，先是使用匕首、长矛、木棍，最后终于枪炮齐上，打起内战来了。造反派要徐英莲帮助他们造枪造炮，美其名曰：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枪炮造出来，要去打对立面的群众组织，徐英莲怎能干这种事。她不去造，她也不同意他们造，她手上多少还有那么点权力嘛！她还得上班搞新产品设计。是呵，在那种年头要坚持上班都是困难的，别说还想继续搞科研了。可徐英莲有个坚定的信念，不论在什么形势下，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，认定为国家搞新产品总没有错，这是科研人员的一条

出路。搞成了，怎么说都是一个进步。于是她象以往一样，亲自设计，亲自组织人，继续坚持不懈地搞科研。就如同她以往组织搞的几十个项目一样。这还得了啦，徐英莲，你这是以生产压革命，以科研压革命，你这是唯生产力论，你这个薄一波的黑干将，黑帮，你往哪里逃？！

徐英莲怎么又同61人“叛徒集团”的为首分子薄一波挂起钩来了呢？

那是文化革命前几年的事情，薄一波副总理来715厂视察，厂长陪他到了设计所，介绍了徐英莲的情况。薄一波听了连连点头，当着徐英莲的面，只问了一下，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徐英莲据实答了。出去以后，薄一波向厂领导表示，象徐英莲这样的技术骨干，工资给的太低了，该给她100多元。

就这一句话，徐英莲成了薄一波黑线上的人物，大字报铺天盖地。你这黑帮分子，你这铁杆保皇派，你还想在设计所里搞科研吗，给我们滚下台来，天天接受两个小时的批判斗争，然后去接受监督劳动。

可怜徐英莲瘦瘦小小的个子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丈夫远在他乡，一天到黑泡在设计所里搞科研，如今还要遭受这种精神的折磨，她瘦得皮包骨头，弱不禁风，往磅秤上一站，只有七十多斤，强迫她劳动，她一点干不动。干不动也得干，她只得咬着牙，满腔委屈的泪水往肚里吞，一步一喘气地干着力不胜任的体力活，熬着那度日如年的日子……

关于这场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徐英莲今天已没时间去抱怨去渲染了，使她难以忘怀的就是这一点：1975年，她出访英法两国，看了几十个工厂，刺激

很大。人家的水平上去了，而我们还在使着五十年代苏联给的机器设备，落后一大截。给她印象更深刻的是日本，60年代初，日本的半导体器件水平和我们差不多，有些厂家还不如我们的国营大厂，可是到了1975年，日本人突飞猛进，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，而我们因为搞了这场“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却一事无成。差距拉大了。想到这一点，徐英莲就恨，恨这场误国误民的“文化革命”。好端端的一个厂，被文革整得一塌糊涂。她痛心疾首地说：“文革浪费了我十年时间，那是对我一生最大的折腾。”

四、命运的抉择

历史的巨轮滚进了八十年代，改革、开放的大潮在全国各地掀起，不少企业在阵痛中艰难地启步，起飞，重新抖开各自的英姿，书写出让人惊叹欣喜的新篇章。振华的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今天她的日子好过，恰是从几年前日子最不好过的困境里走出来的。

似乎是什么人都不曾预料，日子过得安安稳稳，生产计划由部里安排，产品由部里分配的电子企业，竟然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困境。

但是，危机却是在到来，若不及时拿出应急措施，拖下去只会愈加不知所措。这里面有形势变化的原因：军工任务骤减，手中牢牢捧着的饭碗突然砸了，企业吃不饱，亏损日益严重，更糟的是人心浮动，各种各样的传言使得职工队伍吃饭不香、睡觉不稳了。

“三线厂的出路在哪里？”

“呆在山沟里没饭吃，不如迁回去！”

“我们这几千口人怎么办，听说××厂已经动了！”

.....

这里面也有体制上的原因，电子部贵州管理局牌子不小，知情人却说它是个空架子，或叫摆设局。自从雷达局、元件局、通信广播电视总局相继成立以后，部属在贵州的企业便纷纷划给各局各口管理，人、财、物、产、供、销全部统一领导。各主管工业局下达计划和生产任务时，给贵州管理局抄送一份；各企业上报计划和任务时，同样抄送贵州管理局一份。

这里面还有客观环境条件的原因。座落在深山沟里，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区，经济效益不高，信息不灵，不论是市场信息、技术信息、经济信息都落于人后，孤零零单个单个的企业面对急骤变化的形势，甚感力不从心、招架不住。

徐英莲同志坐在贵州管理局局长的位置上，面对这日益严重的局面，既无权指挥企业，又无权统一协调。因而形不成有效的配套能力。因生产任务的严重不足，相当一部分有才气有能力的技术人员外流，跑向外单位，跑向外省，跑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，这一外流又牵动了整个职工队伍的稳定，工厂思迁，人心思走，有的企业已在那里自行联系搬迁地点了。谁还愿在这客观条件差，又没活干的地方呆下去呢？

问题摆在三万多职工面前，摆在北京城各主管局的面前，摆在地方政府贵州省面前，更主要的是摆在那二十几家厂矿企业的头头们面前，首当其冲地摆在局长徐英莲面前：

“要么有职有权大家抱团干！”